

[Studies in Politics]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Japan’s Taika Era Reforms and China’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LI Yuhong ZHAN Lingfeng FENG Junze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12, 2022

Accepted: September 21, 2022

Published: March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Yuhong, ZHAN Lingfeng & FENG Junze. (2023).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Japan’s Taika Era Reforms and China’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 093–10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1](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1>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Japan’s Taika Era Reforms and China’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se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tate learning” under the pressure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how it leads to changes in state formation. In the positive case of Japan’s Taika Era Reforms,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s not a balance of power system, so Japan’s “state learning” behavior is not dominated by the consequence logic and adaptive logic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system. Japan’s Taika Era Reforms are more due to the “elite struggle” Reformists’ desire to obtain political power and “state learning” within the country, which enables Japan to feedback to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through “state learning”. This case show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al press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cannot effectively explain all the situ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formation. In the negative case of China’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press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orced the emergence of “state learning”, the “elite struggle” reformers in the country could not have a stable power base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te learning” was not strong, which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state formation that could not be positively fed back to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Th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eraction”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that “state learning”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China and Japan have different behaviors in the face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tructural pressures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tate learning” will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elites within the country.

Keywords: stat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tructural pressure; large-scale reform;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elite struggl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 Yuho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 email is xr60514@163.com. ZHAN Lingfeng and FENG Junze are master's students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比較政治視角下的「國家學習」與國際結構互動研究 ——以日本的大化革新與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為例

李宇閔 詹凌峰 馮鈞澤

南京大學

摘要:本文嘗試以日本的大化革新與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為正反案例,探討在不同國際結構壓力下「國家學習」的發生的作用以及如何導致國家型態的變化。在日本的大化革新這一正面案例裏,國際結構並非均勢體系,因而日本「國家學習」行為並非均勢體系的後果性邏輯與適應性邏輯所主導。日本大化革新更多是國家內部的「精英鬥爭」改革派取得政權與「國家學習」意願所致,使日本能通過「國家學習」正向回饋給國際結構。此案例說明了均勢的國際結構壓力不能有效說明國家型態轉變的所有情況。在中國清朝洋務運動這一反面案例裏,儘管國際結構的壓力迫使「國家學習」出現,但由於國家內部的「精英鬥爭」改革派無法有穩定的權力基礎以及「國家學習」意願不強,導致國家型態的變化不能正面回饋給國際結構。通過本文的「認知結構-制度變遷互動」假設能有效說明「國家學習」是使中日兩國面對不同國際結構壓力時有不同行為的情況,並凸顯「國家學習」意願與國家內部精英鬥爭的重要性。

關鍵詞: 國家學習; 國際結構壓力; 大化革新; 洋務運動; 精英鬥爭

引言

國際結構與國家的互動一直以來在學界裏都是重要的議題,但大部分的學者並未注意到作為主要行為體的國家為何能適應來自國際結構的規範與淘汰機制? 簡言之,單元怎麼將結構的壓力內化? 從而達到單元能夠適應的情況。對於此議題,縱觀國家關係學界,大部分學者的研究都隱含著國家型態、國家所面臨的環境(結構)均質的假設。然而,回顧國際關係史,國家在不同時代型態不同,其面臨的環境以及壓力也不相同。從這點出發思考國家究竟如何形成? 國家的形成的動力如何產生? 是重新解讀國際關係演變的關鍵。以日本的大化革新為例,當時的日本,為了國家型態的轉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國唐朝時期(618-907AD)日本積極派出遣唐使學習唐朝的制度、行政官僚、律法等,且日本並沒有受到來自生存壓力的壓迫,自願地內化了來自中國唐朝的國家規範。在日本內化這些規範後,平穩且順利地加入了東亞國際社會的互動體系。相較之下,19世紀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則呈現相反的情況。面對西方挾持先進的武器技術與經濟體系的威脅,為了融入西方為主的國際社會,中國清朝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儘管中國清朝也派出留學生並廣泛的學習西方的各種制度技術,但是卻依然艱難地處於國際社會中的邊緣。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國際結構壓力」的差異如何導致國家型態出現變? 「國家學習」的動力是如何產生? 「國家型態」轉變如何導致融入國際社會的差異?

綜上所述,本文關注的重點在不同的「國際結構壓力」導致「國家型態改變」的過程中,「國家學習」發生了何種作用?此外,儘管二者存在於不同時空,但是中日兩國在地理位置、國家型態、社會文化上較為相似,因此二者依然具有可比較的條件。本文對「國家學習」的定義為一國試圖模仿、內化先進國家的國家型態、統治技術、政治制度等規範的行為,此行為與國家的意願、國際環境緊密相關。

問題意識

要回答對於不同的「國際結構壓力」導致「國家型態改變」的過程中,「國家學習」發生了何種作用?這一問題,就必須先對「國際結構壓力」與「國家型態」進行探討,學界先前對此問題大致提出了論兩種解釋。按照學界主流的觀點,在「國際結構壓力」方面,沃爾茲強調國際社會結構對國家會產生因果效應,國家會通過「競爭」(不競爭就被淘汰,後果性邏輯)與「社會化」(不適應國際結構則無法與其他國家交流,適應性邏輯)回饋國際結構。^①溫特認為國際結構分為宏觀結構與微觀結構,宏觀結構是由無數個微觀結構組成,微觀結構是國家與國家的互動。國際社會是由國家集體組成,因此國家會因為身份(社會類別)與利益(國家需求)產生互動。互動的行為結果最後則回饋給(宏觀)結構。^②簡言之,溫特依然認為國家行為受到國際社會影響,只是國際社會的構成是由國家間互動產生。「國家學習」則是遵從國際社會中的適應性邏輯回饋國際社會(結構)。賽門、杜賓和加列特(Simmons, Dobbin & Garrett)認為國家會發生學習他國規範的國際結構壓力機制有四種,即強制、競爭、學習和模仿。「脅迫」是指當強者故意強迫弱者採取行動時,脅迫就發生了;「競爭」是一個橫向的過程,各國在競爭中試圖提高自身相對實力,保證自己不被壓迫;「學習」一般在國家理性評估成本和收益時發生;而「模仿」則是國家從國際社會文化的角度選用他們認為合適的政策或理念。^③黃欽浩等學者則比較了唐朝時期的日韓兩國國家學習的情況,他們認為日韓兩國的案例既非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也非戰爭塑造國家,而是與國內精英、自願的情況有關。^④簡言之,並非是極端的國際環境才會造就國家學習的發生。他們的研究對本文極具啟發性,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對「國家學習」與「精英競爭」提出理論化的框架。國內學者方面較少看到類似的研究。

在「國家型態」方面,大部分的學者基本都認為國際體系結構會自動淘汰不適應的國家,為了適應體系結構國家會自動學習、模仿,只是在國家形成的型態上有差異。對於國家型態的討論,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是政治學研究的熱點。國家形成主要分為內源型國家建構和外源型國家建構兩個流派。內源型國家建構以查爾斯·蒂利為代表,這一派認為國家的形態是國家內部和社會互動的過程。簡言之,國家為了對外發動戰爭因而加強了社會控制,而戰爭的外部影響又回饋給國家與社會。外源型國家建構則以弗蘭西斯·福山為代表,這一派認為國家的形態是因為國家學習外部的制度,即國家通過學習外部的制度,從而不會被國際社會淘汰。然而,這些國家形態的研究都是以西方歷史作為中心,並無法說明非西方國家形態的變化。^⑤國內方面,任劍濤、張啟威、黃其松、左光兵等人對國家建構中的要素進行討論。任劍濤認為權力是區分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的指標,國家權力是否能受到限制是古代國家往現代國家發展的過程。^⑥張啟威、左光兵認為國家的建構來自於國家行政能力,這種行政能力和國家能力的強弱進緊密關聯。^⑦黃其松則認為國家建構有賴於公民的授權,國家的制度、權力形成來源於公民的同意,因此公民必須對國家負起政治責任。^⑧然而,對國家建構的爭論始終沒有定論。目前對於國家建構研究,仍缺乏與國際體系互動的研究。

在洋務運動失敗的研究方面,因為這一直是重要的議題,因此相關研究多如繁星。然而,對於洋務運動失敗的討論仍沒有共識,比如,在思想方面討論學者呼廷芳、謝世誠、黃國耀、張禮恒、楊悅都對洋務運動指導思想進行了討論。^⑨在經濟方面,蔣立文、胡維革、王亞明、孫建華都討論了洋務運動與經濟的關聯,認為洋務運動經濟改革有限。在文化方面,李成家、王列盈、楊勇從認知心理文化、教育文化的角度討論了洋務運

動失敗的原因。^⑩在民族心理方面,孟學華、喻盤庚、周建榮都認為洋務運動與農民起義等事件的關聯,並認為民族心裏的抵抗是改革無法深入的主要問題。^⑪在政治方面,趙九州、楊實生、曹興、劉永春從不同的國內政治角度分析了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源。^⑫

思想方面	經濟方面	文化方面	民族心理方面	政治方面
呼廷芳、謝世誠、黃國耀、張禮恒、楊悅	蔣立文、胡維革、王亞明、孫建華	李成家、王列盈、楊勇	孟學華、喻盤庚、周建榮	趙九州、楊實生、曹興、劉永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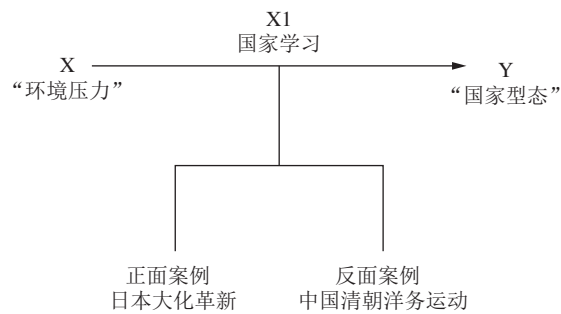


圖 1: 分析架構圖

總體而言,對「國際結構壓力」與「國家型態」的討論並未結束,學者們依然在此議題上沒有達成共識,且大部分研究並探討國家精英的態度以及國家的意願。同時,除了後果性邏輯與適應性邏輯外,是否有其他的解釋? 現有研究依然沒有回答這一問題。基於此,本文試圖回答「國際結構壓力」(X)是如何導致「國家型態」(Y)? 在此過程中,「國家學習」(X1)發生怎麼樣的作用? 本文將以日本的大化革新與中國清朝作為正反案例,以檢驗本文的理論假設。

一、認知結構與制度變遷互動分析框架

首先,對於中日兩國而言,不論是日本的大化革新還是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實際上都是一次「國家學習與國際結構壓力」與「國家學習與國家型態」的互動。此外,二者的國家學習或多或少地與國內的政治精英權力鬥爭有關。從這點考慮,國家學習與國家型態之間應該存在一種政治決策精英的變化,而精英的變化又與國際環境(體系結構)有所關聯。因此,本文將以唐世平的制度變遷廣義理論為基礎,並對從「精英變化」與「環境認知」設置假設,來驗證國際結構中的壓力是否存在造成「精英變化」與「環境認知」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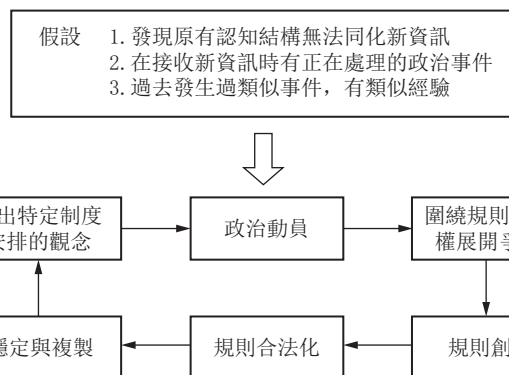
唐世平的廣義制度變遷理論主要討論的是國家內部爭奪制定「制度」的權力。他的論點大致有三點;第一,某個觀念能夠被實踐為制度,是因為有權力支撐,因此制度不一定說明能提高福利。第二,制度可以形塑單元行為。第三,制度變遷的六個階段:產出特定制度安排的觀念、政治動員、圍繞制度制定權展開的爭奪、創建規則、規則合法化、穩定與複製。^⑬儘管唐世平對觀念到制度的實踐非常正確,但是卻缺乏對「政治決策精英對國際環境認知的變化」與「政治決策精英是否能接受、內化新資訊」進行考察。

對於這部分,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則相對做的較好。他認為國家的認知容易受到許多變數影響,因而提出了「錯誤知覺」(theory of misperception)理論。在「錯誤知覺」理論中,決策者產生錯誤知覺的機制有三種,即「認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誘發定勢」(evoked set)、「歷史包袱」(stereotype)。「認知相符」是指決策者外界資訊元素整合進正在形成或業已形成的認知結構內,當遇到決策者無法將新資訊的內化情況,決策者則會將不符認知的資訊自行刪除、斷章取義。「誘發定勢」是指當決策者接收新的資

訊時除了受到固有認知影響外,也受到當前關注的資訊影響。「歷史包袱」則是決策者容易從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與當下的情況進行類比,以獲取有用的經驗。^⑩若我們仔細思考,事實上羅伯特·傑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中的三個變數實際上是與國家意願綁定。當國家自願接受來自外部的新資訊,那麼「認知相符」、「誘發定勢」、「歷史包袱」作用相對較小。若國家是被迫接受來自外部的新資訊,則「認知相符」、「誘發定勢」、「歷史包袱」作用相對較大。簡言之,如果學習意願較高,那麼其他資訊的干擾會減弱;反之,亦然。

基於此,本文試圖融合上述兩種理論作為主要理論框架,即「認知結構與制度變遷」假設。在這個假設中,本文認為日本大化革新能取得成功,正是因為外部壓力的缺失,以及日本政治決策精英較能內化來自外部的新資訊而不被(其他資訊)干擾。不被干擾的原因是改革派政治精英取得政治鬥爭的勝利,因而能掌握權力代表國家。同時,正是因為日本採取積極「國家學習」的行為,確定了國家形態並對結構壓力產生正向的回饋結果。

而中國清朝洋務運動的失敗結果,正是由於過多的外部壓力以及政治精英無法內化來自外部新資訊,且被其他資訊嚴重干擾。被嚴重干擾的原因是改革派無法取得政治鬥爭的勝利代表國家。同時,正是因為中國清朝採取了被動的「國家學習」行為,政治精英無法對國家形態達成共識,進一步造成國家形態對結構壓力的負向的回饋。



	採取「國家學習」的政治精英權力大	採取「國家學習」的政治精英權力小
錯誤知覺小(意願高)	國家型態轉變,順利融入國際結構 (成功學習)	國家型態改變,艱難融入國際結構 (艱難學習)
錯誤知覺高(意願低)	國家型態轉變,部分融入國際結構 (部分學習)	維持現狀,不願融入國際結構 (不願學習)

二、缺失的國際結構壓力與自願學習的日本

為了檢驗日本的大化革新案例,本章將重點說明日本在大化革新時期面對的國際結構與「國家學習」的情況。

首先,在國際結構方面,由於當時的東亞國際社會主要是以中、日、韓三國為主要行為體而中國的影響力在當時屬於最大的一國,因此在國際結構方面主要說明中國的在國際社會的行為。在中國唐朝初期由於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的戰爭與破壞,因此中國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恢復社會生產力上,並沒有過多的實力塑造外部環境。根據當時中國在唐高祖時期以及唐太宗後續的一系列政策就可以看到如此特徵。比如,貞觀元年(627年),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



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強。^⑤在逐漸恢復社會生產後，中國的經濟實力也開始上升。據《新唐書》記載，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鬥。至第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牛馬被野，人行數千裏不資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⑥

在外交方面，在中國唐朝建立後，為了恢復經濟亦採取相對和平的政策，塑造了當時東亞的國際和平環境。許多周邊的政權為了學習唐朝先進的官僚制度、統治技術、國家法律等都紛紛將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知識。據資料顯示，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⑦說明了伴隨中國唐朝的經濟復蘇中國對周邊影響力日漸增加，也促使中國開始計畫對周邊國家關係的安排。另外，中國唐朝當時剛與東突厥、土穀渾、高昌等國結束戰爭，與高句麗的矛盾也逐漸加深，並沒有餘力對日本造成外交壓力。當時中國對於日本的朝貢，更多採取友善的態度。據《舊唐書·倭國志》記載：「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赦免司無令歲貢」^⑧整體而言，在當時國際結構方面，沒有對日本造成壓力，日本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狀態。

在「國家學習」意願方面，對於日本而言，學習中國先進的統治技術可以為日本的國家的權力大幅提升，因而帶動國家形態轉變。然而，這一過程伴隨「國家學習」與「精英鬥爭」一併出現，使國家內部的在此二者上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由於原本的日本內部政治結構屬於部民制（奴隸制），各級貴族佔有大部分的土地分。然而，隨著生產力與部民人數的增加，6世紀開始部民開始要求獨立的地位並開始與貴族進行鬥爭。同時，部分貴族與部民一同起義，造成戰爭規模加大。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貴族們）各置己民，悠情驅使，又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為己財爭戰不已，或者兼併數萬，頃田或者全無容針之地」。此外，當時的社會秩序幾乎崩潰，傳統政治秩序呈現兩極分化的現象。依照《日本書紀》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描述，可以得知，在社會上的一般人出現「五穀不登，百姓大饑」「老者啖草根，死於道垂。幼者含乳與母共死」的景象。^⑨而在貴族中則呈現另一種情況，據記載日本貴族「縱靡靡之日夜，常與宮人沉緬於酒，以錦繡為席衣，以絞縱穿池起苑，以盛禽獸」^⑩人民的反抗與豪族的叛亂，使日本無法再以舊的政治制度進行統治，此現實成為日本統治集團改革的動力。大化革新的政治目的是要加強以天皇為首的中央權力，削弱中小地方豪族的權力，因此當時以聖德太子為首的政治集團開始一系列的改革。

圍繞著「加強皇權」的思想逐漸形成一種政治派系，這一派以聖德太子為代表，試圖改革現狀將「加強皇權」的思想制度化。上述的事例反映了日本在「國家學習」上有學習意願，但「誘發定勢」上，國內的政治社會危機一定程度分散了注意力。儘管日本過去並沒有實施過完全的中央集權制度，但自中國漢朝起與中國的交流，使日本能夠迅速同化來自中國的資訊。聖德太子分別於603年、604年頒佈了《冠位十二階》《憲法十七條》以此限制當時貴族權力^⑪。此外，更於607年開始派員前往中國學習，試圖模仿、吸收中國的統治思想。然而，聖德太子學習中國的改革思想大部分都來自朝鮮半島的中國移民。在聖德太子死後改革派的權力下降，貴族蘇我氏開始又掌控政權導致許多皇室成員與新興貴族不滿。蘇我蝦夷與蘇我入鹿先後在政壇上刺殺了聖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一家，並逐漸將加強皇權的制度廢除。^⑫可以看出對於「加強皇權」這一思想能否制度化以及在政治權力上是否能代表國家，日本內部有著劇烈的鬥爭。在聖德太子有足夠的權力並能代表國家時，整個日本「國家學習」的情況處於積極的態度。在聖德太子死後，國家代表權又回到蘇我氏手中，「國家學習」態度因此下降。

隨後，以天智天皇與天武天皇與蘇我氏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他們間的鬥爭再次爆發，為了贏得國家權力蘇我蝦夷選定舒明天皇繼位。然而，這一舉動卻引起皇室成員不滿。從上述的情況而言，可以說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均圍繞著是否該「加強皇權」的政治制度（規則）制定權的爭奪。隨著日本內部對政治改革的呼聲高漲，在645年以中大兄皇子與中臣廉足為首的改革派發動政變，打倒了蘇我氏的保守派權力。由此日本開始展開大化革新，並確定了「加強皇權」為政治改革的主旋律，國家制度也朝「加強皇權」的方向

前進。646年隨即頒佈《革新詔書》，其內容主要是：第一，宣佈廢除奴隸主貴族包括皇族所直接擁有奴隸的人身依附關係將土地和奴隸劃歸朝廷所有實施公地和公民制度；第二，廢除奴隸制時期的政治組織劃出京師散內的特別地區規定地方官僚機構的主體是國司和郡司；第三，編制戶籍和計帳；第四，實行班田收授法廢除舊賦役統一規定租庸調制。^③大體而言，改革派的勝利與《革新詔書》的出臺可以視為規則確立與規則合法化的體現，從而使日本逐漸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國家形態因此發生變化。^④在大化革新後，為了避免類似蘇我氏的外戚幹政的事件重演確立了皇后必須出自皇族的原則即「皇親政治」。此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皇權與皇位繼承的穩固，若皇位繼承人年幼無法單獨理政則由皇后繼承皇位。^⑤而「皇親政治」基本是延續了大化革新「加強皇權」的原則所制定，體現了對政治規則的「穩定與複製」，也讓日本天皇完全掌握了國家權力。^⑥

總體而言，日本的大化革新符合本文的假設。儘管當時日本正面臨貴族與皇族間的鬥爭，分散了一定程度的「國家學習」的注意力。然而，「缺失的國際結構壓力」「改革派政治精英的掌權」與「國家學習的意願高」，使日本能夠讓國家形態順利轉變並融入國際結構。日本「國家學習」的行為也達成「成功學習」的結果。

三、均勢的國際結構壓力與被迫學習的中國清朝

不同於日本，對於中國而言，面對西方均勢國際結構壓力，促使中國清朝在19世紀60年代展開「洋務運動」。然而，這場由國際結構迫使的政治改革卻沒能讓中國的政治精英在「國家學習」意願與政治改革上提高權力，並推進國家形態變化以適應國際結構的壓力。以傳統三大國際關係理論而言，它們都無法解釋中國的「洋務運動」的嘗試為何會失敗？國際結構的自然淘汰機制為何無法使中國適應國際結構？因此接下來將檢視中國的情況是否與假設吻合。

首先，在國際結構壓力方面，自1860年代起歐洲掀起一陣瓜分亞洲的風潮。當時英國佔領了馬來西亞、緬甸、印度、香港等地；法國則佔領了越南、柬埔寨等地；俄羅斯則從陸上將中亞諸多國家兼併，同時也將本屬於中國領土的外東北地區納入領土。^⑦西方國家接連的殖民亞洲地區，彼此之間又存在著均勢的互動機制，使非西方國家成為這一時代的犧牲品。面對如此的國際結構中國清朝為了正向回饋國際結構的壓力，展開了「洋務運動」的政治改革。洋務運動的目標是使中國富能加入西方的國際結構，並成為均勢互動機制的成員，即「富國強兵」。可以說，清朝中國所面臨的結構壓力非常大，這需要國家快速的做出有效的正向反應才能應對結構壓力。

有效的正向反應又必須依賴「國家學習」的意願，而在「國家學習」的意願方面，中國的政治精英以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文祥等人有強烈的學習動機。這種動機與實際需求有緊密聯繫，中國需要藉由政治改革來加強國家實力克服內憂外患。然而，當中國如火如荼進行洋務運動時，卻仍面臨著有一系列的問題。從1860年起在外交方面，中國先是與俄羅斯在1864年就西北邊界問題簽訂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約》，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又要求中國割讓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地區。^⑧在與法國方面，中法於1885年簽訂《中法新約》中國喪失了對越南的宗主權，以及一系列的邊界民事裁判權。^⑨在內政方面，中國從1851年起就忙於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同時這場內亂帶動了其他地區的反抗運動；如1862年臺灣戴潮春事件；新疆回民事件與1864年的陝甘回民反抗事件；1878年的臺灣少數民族反抗事件（加禮宛事件，Lanas na Kabalaen）；1888年臺灣的施九緞事件。^⑩這些內憂外患都顯示了在內化外來資訊的過程中，清朝中國有著強烈的其他資訊干擾。強烈的資訊干擾導致本來強烈的「學習意願」遭到削弱。

此外，在此之前，清朝中國沒有由外部刺激促使「國家學習」的經驗，因而中國在進行政治改革時無法迅速內化來自西方的資訊。比如在洋務運動開始時，恭親王奕訢表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

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³¹反映了作為洋務派的政治精英的恭親王奕訢僅認為「國家學習」的行為只需在「物質」層面，不需要改變現有的統治技術。然而，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洋務派的政治精英卻將改革重點放在「求富」，從開辦軍事工業的注意力轉移到開辦民生工業。³²更一步說明中國清朝的政治精英對於「國家學習」該到什麼情況並沒有共識，且「國家學習」意願並不堅定。

從上述的分析而言，儘管最初中國有學習意願，但中國須一邊接受結構的刺激、學習新資訊一邊又必須進行政治改革，這導致無法專注在改革上使學習意願不高。而從奕訢的態度可以反映了中國清朝認知無法同化新資訊，認為想要加強結構中的國家實力重點在於武器。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清朝先前並無「國家學習」的經驗，認為只是器物上的不足，進一步驗證了學習意願不高的情況。³³簡言之，中國是有一定程度的學習動機以回應國際結構，符合本文的假設。在資訊干擾以及學習意願不高的情況下，洋務派又必須試圖掌握權力代表國家，才能將「國家學習」的行為貫徹下去。然而，新舊政治精英間的鬥爭，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學習」情況，是本文接下來要分析的部分。

在政治鬥爭方面，圍繞著「富國強兵」「學習西方」等觀念所形成的洋務派，主要以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等人為中心。此外，在洋務運動初期，中國清朝的最高掌權者慈禧太后曾一度支持洋務運動，進而產生強大的權力推行洋務運動。³⁴這一過程體現「學習」「改革」等觀念能夠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強大動員力量，並在改革的過程中能夠有效提供洋務派政治權力。比如，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中國先後聘用英法兩國的軍事教官、大量購買洋槍洋炮。同時，當時的地方力量左宗棠也與法國進行合作，建立洋槍隊，以取代不合時宜的八旗軍和綠營軍。³⁵從奕訢籌辦洋務之初就表示：「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在於練兵」。³⁶之後在 1862 年與保守派倭仁爭論時，再次表示：「洋人制勝之道，專以輪船、火器為先」。³⁷

然而，當洋務派試圖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權力時，卻與保守派產生矛盾。隨著太平天國叛亂在 1865 年被平定、西方各國逐漸承認慈禧在中國清朝政壇的代表合法性，慈禧認為已不再需要洋務派為其保證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慈禧便罷黜了奕訢的職權。³⁸由於慈禧的政治權力來源不合法，為了持續掌握最高政治權力不許任何人的權力過大。慈禧在政治上先清除了傳統滿族勢力，又試圖壓制當時主持洋務運動的恭親王的政治權力，因此慈禧以不適合主持改革為理由，將奕訢的權力廢除。慈禧給出的理由；一是「辦理構情貪妄驕，盈攬權多招物議」；二是妄自羊大，諸多狂放傲，以依仗舟高權壓目無君上。³⁹簡言之，儘管洋務運動是作為慈禧最初獲得權力的工具，但是晚清中國政壇的保守派反對，加上慈禧的權力合法性不足導致洋務運動始終沒有一個既有高度意願又有足夠權力與合法性的政治家推動這一進程。

儘管在其他皇室宗親的不斷抗爭，試圖維持洋務派的領導權力，但慈禧仍在 1884 年將奕訢以及一眾洋務派親信廢除政治權力。同時，慈禧將奕訢輔政的權力移交給保守派醇親王奕譞，並由自己領導洋務運動。⁴⁰在保守派的帶領下，洋務運動雖也開辦一系列的改革工程，但其目標與最初的「練兵」的目標逐漸遠離，而向社會經濟的改革靠近。⁴¹這就導致了中國清朝的學習目標越發的模糊，保守派與洋務派的權力與理念也逐漸失去意義，兩派人馬成為慈禧權力平衡術的工具。⁴²

而從整個洋務運動過程來看洋務派與慈禧之間的鬥爭，可以算是部分符合本文的假設。洋務派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政治權力，並以制度確保改革所需的權力合法性，從而導致中國清朝改革目標始終不明確。在整體的「國家學習」本就意願不高的情況下，沒有一派成功掌握政治權力。慈禧始終代表國家的權力，造成了國家改革或是維持現狀的決定都必須由她決定。⁴³因此「國家學習」的情況，從原來「部分學習」，逐漸往「艱難學習」的結果方向前進。整體而言，儘管有著較強的國際結構壓力，但中國清朝內部精英的分裂與較低的國家學習意願，直接導致了對國家形態的模糊認知，進而無法順利融入國際社會。

四、壓力與意願的差異：中日兩國的異同點

通過比較中日兩國在不同國際結構下與不同學習意願下的情況，可以得知中日兩國在回饋回國際結構

時的根本問題。然而，壓力與意願的差異為何能成為國家形態結果差異的關鍵原因？接下來將對此進行說明。

在人造的國際社會裏儘管不能說一定存在生存淘汰的自然法則，但當面臨一個國家是否面臨壓力時，國家會根據過往的生存習慣性行為進行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國家學習」的意願便逐漸的塑造國家形態的結果。從這點出發，我們就能對中日兩國不同的壓力與「國家學習」意願進行分析。首先，日本的大化革新與清朝的洋務運動都有著現實需求，政治改革的現實需求會直接致使國家形態的轉變的方向。這種轉變的方向均以學習當時先進的統治技術為主。以日本而言，日本的奴隸制統治技術無法滿足內部的秩序需求、維持穩定統治，因此日本就是學習中國的君主集權制。此外，日本從漢代中國開始就與中國有著互動，因此在大化革新前，日本對於中國實力與存在是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從反面案例來看，對中國而言，洋務運動時期，中國不僅面臨內憂外患，巨大的外部生存壓力直接導致內部政治精英對「國家學習」意願的分裂。學習意願的分裂進一步導致政治精英對國家形態的結果無法達成共識，以至於洋務運動到底要達到何種結果這一判斷始終模糊不清。清朝的掌權的政治精英滿人，他們本來就更希望國家保持滿人政治習慣如滿語騎射等，這就與漢人政治精英的期待發生分歧。此外，儘管清代中國建立之初便有與西方互動的經驗，但當時中國並沒有多國壓迫的生存威脅，因此可以說清初中國屬於一種自願的「國家學習」情況成功的雛形，但此一情況卻在外部急迫的壓力下消失了。

其次，若將「國家學習」的意願進行分析，在資訊干擾上，錯誤知覺的出現與學習意願的高低有著直接的聯繫。儘管中日兩國均有出現此類情況，但中日兩國的情況卻又不同。當日本在學習中國統治技術時，正面臨內部貴族的勢力與皇族勢力之間的鬥爭，因而進行國家學習時仍有一些無法集中力量的部分。而中國清朝在「國家學習」時則出現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爭無法將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學習上。此外，不斷地內亂與外患等資訊干擾，造成中國清朝政治精英無法快速內化西方的資訊。在外部壓力過強的刺激下，中國清朝不僅發生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權力鬥爭，更發生了兩派都沒有掌握實權的情況。慈禧的制衡兩派的方式致使洋務運動所推動的「國家學習」無法形成有效制度，保守派的維持現狀也無法落實。最終，慈禧的控制與兩派的僵持，導致了「國家學習」行為收到嚴重干擾直至失敗。

再者，關於壓力是否存在這方面，這項變數直接決定了國家的學習意願，國家的學習意願則影響改革派政治精英的掌權程度。而中日兩國不同壓力的情況說明了只有在自願學習的情況下，國家的改革才能有效進行才能正向回饋來自國際結構的壓力，中日兩國的實踐差異正是在此有了不同的結果。在學習意願與政治鬥爭方面，較高的學習意願較能使改革派政治精英能完成政治轉型，從而將改革的規則合法化形成穩定的權力中心。而較低的學習意願則較容易導致改革派政治精英的失敗，改革派政治精英在此條件下無法穩定將權力合法化，且容易受到其他勢力的制約。比如洋務運動時期奕訢從始終沒有獲得代表國家的實權，且自洋務運動一開始就僅認為中國清朝的與西方的差距只在武器方面。這讓保守派直到洋務運動中期又以經濟社會改革為主。改革目標不明確造成保守派合理認為洋務運動存在問題，需要停止這種目標不清的劇烈變革。

最後，就政治結果與國際結構方面而言，一個國家若能達成「成功學習」的結果，那麼它會自動融入國際結構。而「成功學習」結果又是以「自願學習」態度為基礎，因此可以判斷就是因為日本沒有來自國際結構的壓力。日本有著較大的學習意願，學習意願促使政治結果的目標較為明確，正向回饋國際結構的情況因此出現。在反面案例我們能看到，若一國僅徘徊在「部分學習」與「被動學習」之間，那麼該國的便會處在國際結構的邊緣。「部分學習」與「被動學習」與學習意願較低直接掛鉤，直接導致政治改革結果目標不明確。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不同時空的「現代化」改革與國際結構壓力、「國家學習」以及政治精英鬥爭有著緊密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中國清朝	日本
國際結構壓力	有	無
國家學習意願	較低	較高
政治改革需求	有	有
錯誤知覺是否出現	是	是
錯誤知覺主要體現在哪方面	「認知相符」、「誘發定勢」、「歷史包袱」均有	主要在「誘發定勢」方面
改革派掌權程度	受制於慈禧	主導政權
政治鬥爭情況	失敗,停滯在「圍繞規則制定權展開爭端」的階段,無法將改革的規則確立	成功,完成對規則的「穩定與複製」
政治結果	徘徊在「部分學習」與「被動學習」之間	「成功學習」

五、結語

通過本文的假設,我們發現舊有的結構壓力與學習、社會化的假設無法詮釋中日兩國面對國際結構壓力與回饋的情況。日本的大化革新之所以能夠成功,更凸顯的是高度的學習意願與較少的國際壓力才能使國家學習與社會化有效的實踐。而在中國清朝的案例,反應的是大部分國家在面臨結構壓力時,強迫的形式更多是致使國家學習意願低下,進而造成政治改革的失敗,國家因此只能在國際結構邊緣徘徊。國際結構與「國家學習」之間的關聯性也說明了結構與單元的互動,事實上是個體意願與集體行為之間的問題,並非只是「單純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情況。其次,權力的掌握與錯誤知覺呈現正相關。當一國的改革者若能獲得較大的權力戰勝保守派,那麼一國的錯誤直覺產生的程度較小。反之,若無法掌握充分的權力,形成改革派與保守派均勢或無法勝出的情況,將會導致國家的錯誤知覺的程度加強。

此外,從中日兩國的改革對比,一國的國家形態事實上與「權力較大者」的行為綁定,這一關鍵決定了國家行為體如何回饋國際結構? 回饋的結果是正向還是負向? 從這個角度而言,儘管日本內部有許多變數間接影響著改革的走向,但是塑造正向回饋機制的正是因為改革派「權力」與「意願」的雙重作用。而清朝則因缺失了這兩項關鍵變數,造成了負向的回饋機制,最終得到改革失敗的結果。

注釋

- ① 秦亞青:《結構現實主義方法論批判》,《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 ② 亞曆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頁140-454。
- ③ Dobbin, F., Simmons, B., & Garrett, G. (2007).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petition, or learning?. *Annu. Rev. Sociol.*, 33, 449-472.
- ④ Huang, C. H., & Kang, D. C. (2022). State formation in Korea and Japan, 400 - 800 CE: Emulation and learning, not bellicist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1), 1-31.
- ⑤ 林華山、羅振建:《新型國家形態的獨特道路——以統一戰線為視角》,《理論與改革》,2019年第6期,頁14-28。
- ⑥ 任劍濤:《駕馭權力與現代國家架構》,《探索》,2015年第2期,頁96-105+193。
- ⑦ 張啟威、左光兵:《國家建構:理論始源與中國研究的局限》,《理論前沿》,2012年第3期,頁24。
- ⑧ 黃其松:《制度建構與民族認同:現代國家建構的雙重任務》,《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頁36-40。
- ⑨ 謝世誠:《晚清吏治的腐敗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1期。
- ⑩ 李成家:《洋務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認知研究》,《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

- ⑪ 孟學華:《試論太平天國對洋務運動失敗的影響》,《當代經理人》,2006年。
- ⑫ 趙九州:《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問題研究》,《中共遼寧省委黨校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⑬ 唐世平(2009):國際政治的社會進化:從米爾斯海默到傑維斯,《當代亞太》2009年第5期,頁4-31。
- ⑭ 唐鍵:《系統、時間和社會進化——評唐世平的〈國際政治的社會進化〉》,《國際政治科學》2015年第2期,頁124。
- ⑮ 羅伯特·傑維斯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頁120-225。
- ⑯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食貨志一,卷51》,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27。
- ⑰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食貨志一,卷51》,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1344。
- ⑱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食貨志一,卷51》,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1163。
- ⑲ 劉日句:《舊唐書倭國傳,卷199》,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5340。
- ⑳ 《日本書紀卷25》,孝德大化元年。
- ㉑ 《日本書紀卷22》,推古36年、34年。
- ㉒ 《日本書紀卷16》,武烈8年。
- ㉓ 接培柱:《試論日本大化革新的原因》,《齊魯學刊》,1986年第2期。
- ㉔ 李運明:《論日本大化革新的曲折道路》,《史學月刊》,1990年第1期,頁97-101。
- ㉕ 何德偉:《儒學傳入日本與大化革新》,《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6期。
- ㉖ 王順利:《甲子改革與大化體制的延續》,《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 ㉗ 章林著:《古代日本皇親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
- ㉘ 王輯五著:《1600年以前的日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 ㉙ 吉村武彥著:《蘇我氏的興亡》,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 ㉚ 王海燕著:《日本古代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12年版。
- ㉛ 勞倫·本頓著:《1400-1900年歐洲諸帝國的法律與地理》,北京:世界當代出版社,2022年版。
- ㉜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 ㉝ 川島真著:《近代中國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 ㉞ 柯志明著:《蕃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蕃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年版。
- ㉟ 丁賢俊著:《洋務運動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 ㊱ 薑秀玉:《近代東亞中朝日三國的社會變革研究-以戊戌變法 甲申政變與明治維新為比較中心》,《延邊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 ㊲ 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期。
- ㊳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務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冊頁5。
- ㊴ 中華書局編譯局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卷25頁1-10。
- ㊵ 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頁22-30。
- ㊶ 楊實生:《清流與晚清政治變革》,《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 ㊷ 璞蘭德、白可浩司著:《慈禧外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頁7。
- ㊸ 張宏豔:《慈禧與洋務運動》,《世紀橋》,2003年第1期。
- ㊹ 薑鐸:《慈禧與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
- ㊺ 李成家:《洋務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認知研究》,《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

(Editors: LENG Xueyuan & JIANG Qing)